经 济 学 研 究

经济转型视角下我国收入差距动态变化研究

叶静怡　程　强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动态变化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构建个人(家庭)最优化决策模型,根据我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对居民财富积累路径和分配机制的影响,分析收入差距动态变化的原因,讨论未来出现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可能性。经济转型促使分配机制从单一的管制工资收入向市场化的人力资本收入和企业投资收入转变,创造了个人基于自身禀赋选择财富积累方式的机会,打破了平均主义下的低收入状态,促使我国进入收入增长、贫富差距拉大的发展阶段;当(1)人力资本生产率不断提升,大部分人都有能力选择人力资本积累方式,(2)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越来越少,大部分人有意愿选择企业投资积累方式,我国就有可能进入收入增长、收入和财富差距缩小的阶段。

关键词: 经济转型;收入分配;人力资本;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F 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1-0124-13

一、研究背景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经济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快速提高的四十年,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随着经济的转型,单一分配机制和平均主义被多样化分配机制和收入不平等所替代,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不足 0.3,持续升高近 30 年,在 2008 年达到最高值 0.491。此后,收入差距进入一个低幅缩小和波动期,但基尼系数仍然在 0.46 以上(参见图 1)。我国尽管没有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两极分化,但不断接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区间的上限,并在此上限区间徘徊,已经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公平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重大问题,关系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化解。

我国学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就高度关注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经济转型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动态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依据和价值重大的思考及辨析。从 1978 年至 2008 年,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对此,学术界是没有任何分歧的,但 2008 年后收入差距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的趋势如何,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认识,李实的判断是收入差距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期,在此期间收入差距会出现短期的波动,既不可能出现长期持续的缩小,也不会出现长期持续地扩大。①

国外较早研究收入分配动态演化问题的是 Kuznets,他首先根据美国、德国和英国的统计数据发现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现缩小趋势,然后在讨论抵消财富集中效应和城乡人口分布等因素之后,解释了在人口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时,如果城镇中低收入人口占比较低的情况下会出现收入分配的平等化。②此外,Kuznets 还发现那些欠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更大,而且还在恶化。Kuznets 及其跟随

收稿日期:2018-10-10

作者简介:叶静怡,女,广东广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① Li, S., "Four Decades o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2018, *China Economist* 13 (4): 2-33.

②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195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1-28.

者据此推测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会出现“倒 U 型”曲线。后来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论述了“倒 U 型”曲线可能出现的机理。Greenwood and Jovanovic 引入金融中介,认为只有个人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选择金融中介,那么穷人会选择高储蓄率并只能获得低投资回报率,但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制度完善和财富积累,穷人最终也可以使用金融中介,与富人的财富差距会形成先扩大后缩小的“倒 U 型”趋势。① Tamura 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作用,在一个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投资的溢出效应使得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力资本拥有者比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力资本拥有者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② Acemoglu 通过构建富人与穷人斗争模型,论述了“倒 U 型”曲线出现的政治经济博弈条件,并解释了如“东亚奇迹” “独裁灾难”等不同于“倒 U 型”曲线的其他动态演化路径。③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动态演化的研究也积累了一定成果。侯风云等的模型认为,中国的城乡差距是由城乡初始资源禀赋差异、城乡发展政策和市场规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只有转变发展战略,加大对农村支持,才可以有效缩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④ 王弟海和龚六堂的结论是,当经济处于不发展时期,资本回报率和教育投资成本相对都高,工资和收入不平等分布呈现金字塔形,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回报率不断降低,教育成本也相对下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会增加,收入和工资不平等分布会向“橄榄球形”过渡。⑤ 董直庆等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了我国家庭财产的动态分布,认为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有利于提高学习能力在财产积累中的贡献,助推学习能力占优的家庭财产位次向上跃迁,而使社交能力占优的家庭财产位次下降,从而改变财产分布的不均等状况。⑥

本文试图从经济转型影响收入分配机制变化的角度,分析我国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并讨论我国有没有可能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持续缩小的趋势。我们将经济转型和制度环境作为个人选择财富积累决策的外部制约,分析分配机制从单一的管制工资收入向市场评价的人力资本收入、经营企业收入等多种机制转变过程的影响,论证收入差距从平均到不断扩大再到缩小的动态变化,以及相应的约束条件,证明收入差距变化的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在我国出现的可能性⑦。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本文沿用李实的思路⑧,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这个阶段中的收入分配结构比较平等,但人均收入水平却很低;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年,这个阶段中的人均收入水平快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平等逐步扩大;第三个阶段是 2008 年以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得到缓解,但仍未出现明显的缩小趋势。我们认为,三个阶段的划分依

---

① Greenwood, J. and 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1076-1107.

② Tamura, R., “Income Convergence in an Endogeneous Growth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522-540.

③ Acemoglu, D., “Why Do New Technologies Complement Skills?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and Wage Inequa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4): 1055-1089.

④ 侯风云、付洁、张凤兵:《城乡收入不平等及其动态演化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理论机制》,《财经研究》2009 年第 1 期,第 4—15 页。

⑤ 王弟海、龚六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分布与工资不平等》,《世界经济》2009 年第 8 期,第 68-82 页。

⑥ 董直庆、蔡啸、王林辉:《财产流动性与分布不均等:源于技术进步方向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0 期,第 72—92 页。

⑦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广泛而复杂,如再分配政策、税收结构等均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全面讨论,因此本文仅基于其中的一个经济转轨的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⑧ Li, S., “Four Decades o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China Economist*, 2018, 13 (4): 2-33.

据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特征,而且是制度变革和政策变化特征,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区分的依据是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划分体现了党中央把收入分配在平衡公平与效率关系中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高度,首次提出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①。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前(1956—1978)

建国初期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高,1953 年基尼系数达到 0.558②,1956 年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收入分配差距快速缩小。国有化消灭了私营经济是收入差距快速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1956 年国有经济已经在我国国民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 92.9%,此后这一比重持续提高,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改革开放前已经完全不存在。

计划经济对工资的严格控制和实施“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战略,是这个时期收入差距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政府作为“全能企业”几乎掌控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不仅通过对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进行严格控制,还通过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经营的人民公社制度和价格管理,把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化建设中。自 1956 年至 1978 年,劳动收入几乎是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唯一源泉,城市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成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最主要来源。1957 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 73 元,而城镇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 637 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 571 元,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有 8.5 倍;消费水平方面的城乡差距相对小些,1957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82 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222 元,后者是前者的 2.7 倍③;我国 1979 年全国基尼系数为 0.33,1980 年城镇基尼系数只有 0.16④。

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在建国早期的工业基础建设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随着国民经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逐渐丧失,通过行政方式分配资源变得越来越没有效率,国民经济陷入了一个“均等贫困”的陷阱。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78 年相比 1958 年,我国人均消费支出在 20 年间累计实际增长只有 41.3%,1980 年我国人均 GDP 只有 156.4 美元,在世界银行所统计的 164 个国家中排名 161 位⑤。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 30 年(1978—2008)

改革开放产生了解放生产力的巨大效应,2008 年与 1978 年相比,人均 GDP 实际增长了 11.9 倍,年均增速为 8.6%⑥。收入分配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有关学者的测算数据,从 1985 年至 1993 年的八年间,我国基尼系数由 0.3 左右的水平快速上升至 0.4 左右的水平,提高了 30%以上;2002 年前后突破了 0.4 的国际警戒线,在美国金融危机传导到中国的 2008 年达到最高值(0.491),此后基本延续了下降的趋势(见图 1)。城乡差距依然是影响全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1984 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 2.93 倍下降到 2.15 倍,同期全国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保持在 0.3 的水平之下;1985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了持续上升趋势,2004 年达到最高值(3.77 倍),同期基尼系数突破了 0.4(见表 1)。

在这一时期还存在另外两个明显且重要的结构变化。

---

① 见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前“初次分配注意效率、再分配注意公平”的分配政策进行了调整。

② Alesina, A. and Perotti, R.,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40(6): 1203-1228.

③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经济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

④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1983,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

⑤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1983,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

⑥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六十年经济资料汇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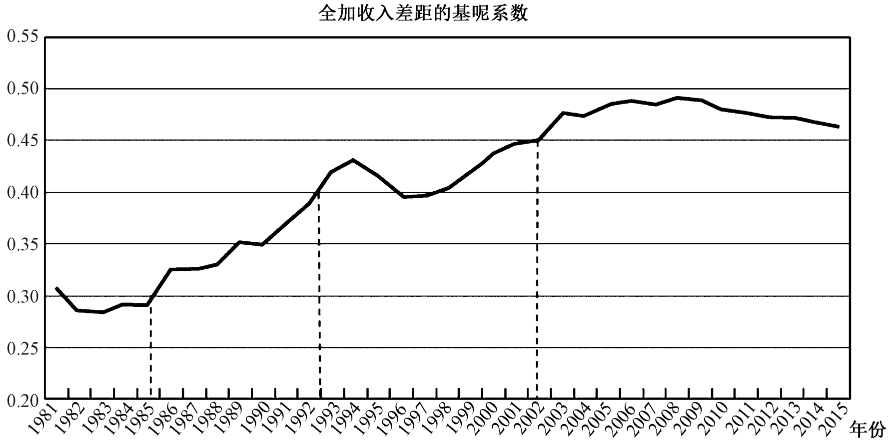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学者计算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①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年份	人均 GDP (元/人)	城乡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比	高校毕业生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非公有企业数量占比(%)	非公有企业产值占比(%)
1978	381	2. 93	1. 7	0. 0	0. 0
1979	419	2. 67	0. 9	0. 0	0. 0
1980	463	2. 75	1. 5	0. 1	0. 1
1981	492	2. 59	1. 4	0. 1	0. 6
1982	528	2. 40	4. 5	0. 2	0. 7
1983	583	2. 23	3. 3	0. 2	0. 9
1984	695	2. 15	2. 8	0. 2	1. 2
1985	858	2. 19	3. 0	0. 4	3. 1
1986	963	2. 31	3. 7	0. 4	4. 2
1987	1112	2. 37	4. 9	0. 8	5. 7
1988	1366	2. 58	5. 0	1. 1	7. 1
1989	1519	2. 67	5. 1	1. 4	8. 2
1990	1644	2. 85	5. 4	1. 8	9. 8
1991	1893	3. 06	5. 3	2. 1	10. 8
1992	2311	3. 29	5. 2	2. 8	13. 4
1993	2998	3. 63	4. 8	6. 2	19. 0
1994	4044	3. 71	5. 3	8. 4	24. 9
1995	5046	3. 76	6. 6	10. 2	29. 4
1996	5846	3. 40	6. 9	12. 1	24. 3
1997	6420	3. 38	6. 7	14. 6	30. 3
1998	6796	3. 53	6. 7	31. 9	30. 9
1999	7159	3. 63	6. 7	42. 4	34. 0
2000	7858	3. 68	7. 5	44. 0	38. 8
2001	8622	3. 61	8. 1	54. 6	45. 0

① 图 1 转引自 Li Shi, "Four Decades of China's Income Distribution Reform", *China Economist*, 2018, 13(4): 2-33. 其中:1995-2001 年的基尼系数来自:Ravallion, Chen, "China's (unever) Progress A go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s*, 2007, Volume 82, Issvel 1-42;2003-2015 年的基尼系数来自国家统计局;2002 年的基尼系数来自: Gustafsson, Li and Tery eds. *Inequality and Public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cl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续表

年份	人均 GDP(元/人)	城乡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比	高校毕业生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非公有企业数量占比(%)	非公有企业产值占比(%)
2002	9398	3.58	10.4	62.2	50.5
2003	10542	3.76	14.5	71.0	55.8
2004	12336	3.77	18.4	75.9	59.1
2005	14053	3.68	23.5	84.0	63.3
2006	16165	3.66	28.7	87.0	65.9
2007	19524	3.65	33.9	90.0	68.0
2008	22698	3.60	38.5	92.3	69.9

注:(1)非公有企业是指在全部工业企业中剔除了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外的企业。1985—1997 年企业单位数和工业总产值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1996 年及以后年份国有企业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998—2006 年工业企业单位统计范围为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 年以后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数据均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其一是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长和教育回报率的变化。我国在 1977 年 12 月正式恢复高考制度,普通高等学校当年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1.7‰上升到 2008 的 38.5‰,人数增长 30 多倍(见表 1)。伴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模式也从统一分配向自主择业的市场模式转变,教育回报率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呈现出了明显差距。李实等①根据 1995 年数据的估算,我国企业职工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 5.9%,其中外资企业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最高(7.1%),国有企业要低于平均水平(5.2%)。张义博②将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研究所和国有企业单位定义为公共部门,研究发现,1989—1997 年非公共部门的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公共部门。

其二是非国有企业占比不断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 年我国工业企业几乎全部都是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企业总量的 100%,国有工业企业单位和集体工业企业单位数量分别为 8.37 万个和 26.47 万个,到 2008 年分别减少到 0.97 万个和 1.17 万个,公有制企业的占比下降到了 7.7%,同时期私有企业则从 0 增长到 24.59 万个③,占比上升到了 92.3%,相应地,公有制企业产值占比下降到了 30.1%,私有企业产值的占比上升到了 69.9%(见表 1)。在生产所有制变革的基础上,收入分配从原来单一的劳动收入机制(按劳分配)转变为劳动收入、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等多种机制并存(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数据显示,1990 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年收入来自工资性收入的部分占比为 75.8%,到 2008 年这一比例降低到 66.2%④。

第三阶段:2008 年以后

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把分配领域的改革定位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标志着党中央把收入分配公平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 2008 年开始出现了持续 7 年的下降,这是注重公平性的政策实施以及其他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再分配的角度看,围绕着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党中央和国务院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政府实施的两项政策对个人或家庭收入结构产生直

① 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14 页。

② 张义博:《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经济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77—88 页。

③ 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统计。

④ 中国 2008 年统计年鉴,考虑到企业股权、不动产价值等资本增值性收益在未变现之前无法统计到年收入中的情况,实际收入中的工资占比可能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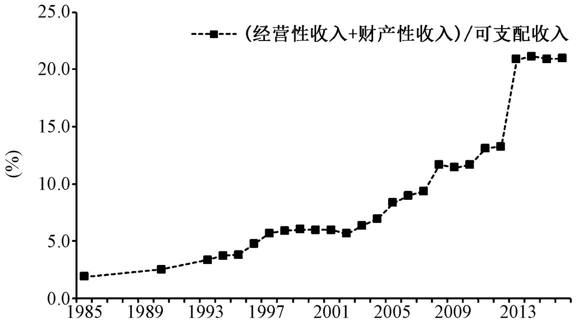

图 2　城镇家庭人均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

注:(1)由于农村居民主要的财产是土地,但目前土地的价格以及产生的租金无法市场化,因此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统计可能会存在低估,因此我们选用城镇居民的数据;(2)从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与 2013 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

接影响。一是国家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重视和相关激励政策。我国政府从 2008 年开始实施从国外吸纳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随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相应出台了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这一政策直接提高了高层次人才的教育回报率。另一政策是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限制。2009 年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上限,严格控制和监管职务消费,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大降低了与企业垄断地位和权力关联的薪酬,间接提高了教育投资回报率。

资本深化即人均拥有资本量的提升,是影响长期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本量出现持续增长趋势,但收入分配差距在 2008 年却发生了变化,GDP 增长速度也从 2008 年开始减缓(见图 3)。资本深化速度并未因经济增速下行而明显放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生产过程的劳动密集度下降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我国就业人口 2008 年为 7.6 亿,2016 年为 7.8 亿,增长了 2.7%,同期 GDP 实际增速累计达到 86.6%,相当于单位就业人员创造的 GDP 增加了 84%左右,这就是说,我国 2016 年创造等量 GDP 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是 2008 年的 50%。从总收入区分为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视角看,资本深化可能会出现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导致收入分配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差距扩大;但如果伴随资本深化或者劳动密集度下降,出现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替代、人力资本价值和市场回报率提高,那么资本深化就可能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人口密集度下降、人力资本回报率提升可能是 2008 年以来的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推动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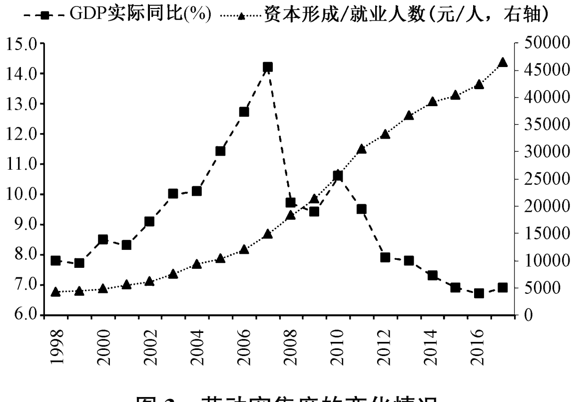

图 3　劳动密集度的变化情况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我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对居民财富积累路径和分配机制的影响以及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假设每个微观个体都是理性的,他们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依照自身的禀赋在消费和闲暇之间做出最优选择。为了分析的简化,我们假设个人存活两期,在第一期通过劳动获得财富,在第二期将第一期获得的财富用于消费和代际积累。第一期不劳动时的闲暇以及第二期的消费水平均能带来效用的提升。

个人效用函数采用 CES 形式,即:

$$U = \frac{{l_t}^{1-\sigma} + {c_{t+1}}^{1-\sigma}}{1 - \sigma}$$

其中,l_t 表示当期的闲暇,个体在当期的时间约束为 1,在劳动和闲暇之间分配,用 n_t 表示投入的劳动,则约束方程为:

$$l_t + n_t = 1$$

在第二期,个体还要面临一个将财富中的多大比例用于消费的选择。我们假设这一比例维持稳定不变①,在消费比例不变假设下,个体的跨期消费决策问题可以简化为跨期财富最大化问题。

$$c_t = (1 - \omega) h_t$$

c_t 表示当期的消费,h_t 表示当期的财富。下一期的财富 h_{t+1} 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当期的劳动投入 n_t,二是当期的财富存量 h_t,三是这两者组合的生产方式。存量财富增值的途径是投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和投资开办企业。市场化转轨进程对家庭财富增长差异的主要影响机制是家庭财富增加组合方式的可获得性。社会总财富是加总的 $\sum h_t$,其大小可以表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h_{t+1} = H(n_t, h_t)$$

$H(n_t, h_t)$ 的代表性形式是从事简单劳动获得收入、通过投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收益和通过开办企业的方式获得经营和财产性收入。我们将这三种积累路径分别假定为:

(1)简单劳动收入。$H_1(n_t, h_t) = \Theta(n_t) + \mu\omega h_t, \Theta(n_t) = \gamma n_t$,其中假定每单位劳动投入获得 1 单位劳动产出,γ 是劳动效率系数,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果制度无法惩罚偷懒和吃大锅饭,则 $\gamma < 1$,如果制度激励勤奋,则 $\gamma > 1$,中性情况下 $\gamma = 1$)。个人获得的直接收入是劳动收入,还获得由国家掌控的生产剩余再分配收入,对产出的分配存在一个折算系数 μ,它的大小决定于政策和体制。

(2)通过投入教育积累人力资本获得收益。$H_2(n_t, h_t) = \theta n_t h_{ct}^{\gamma} = \theta n_t (\omega h_t)^{\gamma}, h_{ct} = e_t = \omega h_t$,其中假定上期留存的财富投入到教育中,获得等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的结合采用规模递增的 Cobb-Douglas 函数形式。

(3)通过开办或投资企业的方式获得经营和财产性收入。$H_3(n_t, h_t) = L^{\alpha} (\omega h_t)^{\beta} - L + n_t$,其中假定上期留存的财富通过购置资本形成企业投资,与雇佣劳动结合在一起获得的收入减去除自己以外的劳动报酬形成的收入,其中 L 表示雇佣的劳动。

个人会理性地选择最优的积累路径,但个人的 $H(n_t, h_t)$ 形式选择受到经济体制制约,在经济转轨之前和初期可选择的路径有限,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推向深入,个人可选择的积累路径才越来越多。

① 这一假设可能与消费比例随收入增长而下降的现实情况不完全符合,但考虑这种变化只有在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增长后才会出现,而我国居民收入在平均意义上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这个假设并不影响本文的核心结论,如果将消费倾向做内生化处理只能让模型复杂化以至难以求解。

(一)低收入下的收入均等化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前,私人经济逐渐被消灭,实行国家主导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财富积累只能通过第一种方式实现,$h_{t+1} = H_1(n_t, h_t) = \Theta(n_t) + \mu\omega h_t$。国家不仅作为公共资本的代理主体获得资本收入利息,而且掌握和支配扣除资本利息和劳动工资后的全部生产剩余,将其大部分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和产业建设,将其小部分通过各种形式再分配给居民,因此个人的剩余财富的折算系数为 $0 < \mu < 1$。同时,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滋生出来的吃“大锅饭”现象和个人激励不足,导致实际劳动产出水平低于既定技术水平下的可能产出水平,换句话说,实际产出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少于名义劳动时间的,因为有人“出工不出力”,即 $n_t > \Theta(n_t)$。假设 $\Theta(n_t) = \gamma n_t, \gamma < 1$。

如此,根据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出:

$$h_{t+1} = \mu\omega h_t, n_t = 0, \text{当 } h_t > \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mu\omega} \text{时;}$$

$$\begin{cases} h_{t+1} = \d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sigma}}}{\gamma + (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 + \d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mu\omega h_t}{\gamma + (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 \\ n_t = \d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gamma + (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 - \dfrac{\mu\omega h_t}{\gamma + (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 \end{cases}, \text{当 } h_t \leqslant \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mu\omega}$$

改革开放以前的 h_t 比较低,我们假设满足 $h_t \leqslant \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mu\omega}$ 的条件,因此分析时可以选择图 4 曲线的左侧半段。也因为存在着出工不出力的“搭便车”现象,n_t 要小于 $\Theta(n_t) = n_t$,($\gamma = 1$) 时的 $\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1 + (1-\omega)^{\frac{1-\sigma}{\sigma}}} - \frac{\mu\omega h_t}{1 + (1-\omega)^{\frac{1-\sigma}{\sigma}}}$,即居民降低了劳动投入。从上述动态方程可以看出,如果个人拥有财富总量越大,那么他会理性地选择将较少时间用于劳动,相对更多时间用于闲暇。如果财富量为 0,那么个人选择将第一期 $\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gamma + (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 比例的时间用于劳动,随着财富量的增加,第一期参加劳动的时间比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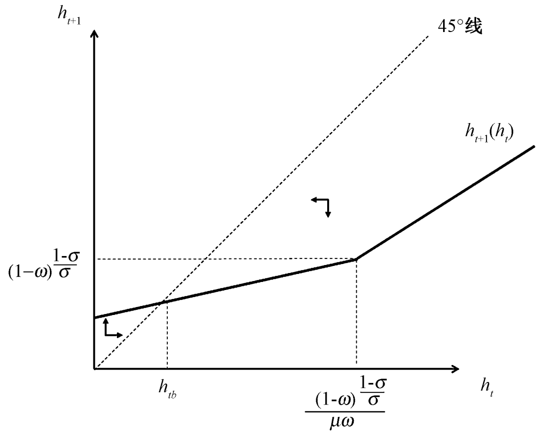

图 4　低收入陷阱

均衡时，$h_{tb}=\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sigma}}}{\gamma+(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1-\mu\omega)}<1$，而且均衡是稳定的。由于生产剩余由国家分配，人力资本积累受到限制，个人经商办企业为非法行为等等，个人无法选择除了劳动之外的其他财富积累路径，个人拥有的财富量会逐渐向 h_{tb} 收敛。在我们的模型中，$\sum h_t$ 表示社会总财富，同时也代表经济体的总收入水平，开始时每个人的 h_{0i} 有所不同，但随着时间推移，都会收敛至 h_{tb}，而 $h_{tb}<1$，绝对值较低，这意味着经济会收敛至一个“均等的贫困”状态，陷入一个“低水平陷阱”，即社会总财富水平比较低，但每个人之间的差异不大。

命题 1：在国家所有制和准国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时，资源配置采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收敛到一个人均社会财富的低水平，且贫富差距逐渐缩小。

(二)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打开与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和高考制度的恢复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巨大变化，市场在人力资本定价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个体根据自己的禀赋在第(1)和第(2)财富积累方式中进行选择，收入差距开始扩大。

如果个人或家庭选择投入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2)，那么最优条件可以解出：

$$n_t=\frac{\left[(1-\omega)\theta(\omega h_t)^{\gamma}\right]^{\frac{1-\sigma}{\sigma}}}{1+\left[(1-\omega)\theta(\omega h_t)^{\gamma}\right]^{\frac{1-\sigma}{\sigma}}}$$

则：

$$h'_{t+1}=\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left[\theta(\omega h_t)^{\gamma}\right]^{\frac{1}{\sigma}}}{1+\left[(1-\omega)\theta(\omega h_t)^{\gamma}\right]^{\frac{1-\sigma}{\sigma}}}=\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theta\omega^{\gamma})^{-\frac{1}{\sigma}}h_t^{-\frac{\gamma}{\sigma}}+(1-\omega)^{\frac{1-\sigma}{\sigma}}(\theta\omega^{\gamma})^{-1}h_t^{-\gamma}}$$

根据 Glomm 的分析，这个函数的特点是先凸后凹，与 45°线除零点外有两个交点，第一个交点 h_1 是不稳定均衡点，第二个交点 h_2 是稳定均衡点(见图 5)①。从左侧向稳定均衡点收敛的过程中，收敛速度先增大后减小。如果个人的初始财富小于 h_1，那么沿着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其动态变化会向 0 收敛，基于最优化决策的个人此时不选择人力资本积累路径，而选择简单劳动的积累路径(即选择图 5 中更高的线作为积累路径)，即继续向 h_{tb} 收敛。如果个人的初始财富大于 h_1，那么沿着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其动态变化会向 h_2 收敛。接下来我们将给出更为严谨证明，什么样的条件因素促使人力资本积累财富路径引入会带来的贫富分化。我们将 $h'_{t+1}(h_t)$ 线和 $h_{t+1}(h_t)$ 的交点记作 h^*。

如果 $h_1<h_{tb}$，那么在 h_1 左侧的财富积累方式首先沿着简单劳动供给的模式向右推进，一旦超过临界状态 h^*，即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高于简单劳动收入的可能性出现后，财富积累方式开始按照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进行，最终经济收敛到人力资本积累下的均衡点 h_2，此时社会总财富也达到较高的水平(见图 5)。同时，按照 Glomm 的分析，由于 h_1 右侧的曲线是凹性的，所以财富积累的速度会先加快后减慢，在财富积累速度加快阶段，财富差距逐渐拉大，在财富积累速度减慢阶段，财富差距逐渐缩小，出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倒 U 型”库兹涅茨曲线。

如果 $h_1>h_{tb}$，那么如图 6 所示，在 h_1 左侧的积累模式会逐渐收敛到低水平均衡 h_{tb}，而 h_1 右侧的积累模式会逐渐收敛到 h_2，最终导致财富积累在个人或家庭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成为可能之前，个人只有简单劳动一种积累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在引入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之前的初始时刻，个人财富围绕着 h_{tb} 分布，分布在 h_{tb} 右侧的人中一些人处于 h_1 左侧而另一些处于右侧。对于处于 h_1 右侧的人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逐渐收敛至 h_2 的高水平，但是处于 h_1 左侧的人会出现不同的

① Glomm, G. and Ravikumar, B., “Increasing Returns, Human Capital, and the Kuznets Curv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55(2): 353-367.

命运。对处于 h^* 右侧同时又处于 h_1 左侧的人或家庭来说,尽管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带来的未来财富有可能高于简单劳动积累路径,但由于少量投资不成规模,收益很低甚至没有收益,如此一来,通过教育投资积累人力资本带来的收入还不如上期的财富存量,也就是出现“因教致贫”现象,一旦财富量减少到 h^* 以下(左侧),那么个人或家庭会理性地选择不积累人力资本而从事简单劳动,从而收敛至低水平的 h_{tb},这就会出现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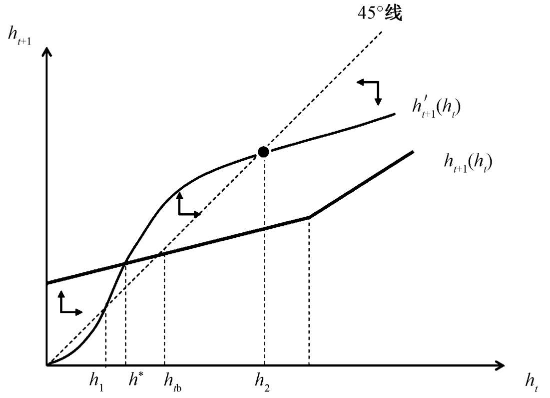

图 5　人力资本积累路径与收入差距的“倒 U”型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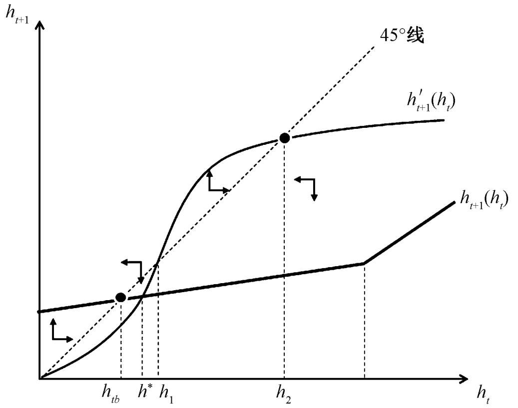

图 6　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富分化

那么,在我们的模型中是什么因素决定着 $h_1 > h_{tb}$ 的出现呢? 由于很难对这一条件解出解析解,我们将条件收紧为当 $h_t = 1$ 时,$h'_{t+1}(h_t) < h_{t+1}(h_t)$,求解其充分条件,得:

$$\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theta\omega^{\gamma})^{-\frac{1}{\sigma}} + (1-\omega)^{\frac{1-\sigma}{\sigma}}(\theta\omega^{\gamma})^{-1}} < \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gamma+\mu\omega)}{\gamma+(1-\omega)^{\frac{1-\sigma}{\sigma}}\gamma^{\frac{1}{\sigma}}}$$

根据单调性,左式随 θ 增大而增大,且当 $\theta \to 0$ 时,左式=0,当 $\theta \to \infty$ 时,左式=∞,所以,一定存在 $\theta < \theta^*$,使得上式成立,就是说如果人力资产收益率 θ 足够小,一定充分的保证当 $h_t = 1$ 时,$h'_{t+1}(h_t) < h_{t+1}(h_t)$,也即保证 $h_1 > h_{tb}$,则一定会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

命题 2:存在一个足够小的人力资本收益率 $\theta < \theta^*$,以使得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当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成为个人家庭的一个选择时,必然导致出现贫富分化。

(三)私有产权和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合法化后的分配差距拉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或间接投资实业或经商成为个人或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方式。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情况,个人选择用当期的财富投资办企业①,雇佣 L 单位的简单劳动力,如果雇佣的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可以按照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比例进行折算。企业使用的总劳动力中包括投资者兼管理者自己,所以企业家除了获得经营性的资本收益 $L^{\alpha}h_t^{\beta}-L$,还获得自己作为管理者投入劳动的劳动收益 n_t。

$$h''_{t+1} = H_3(n_t, h_t) = L^{\alpha}(\omega h_t)^{\beta} - L + n_t$$

由于改革初期资本市场的不健全,个人只能靠自有资本去开办企业,所以我们的模型中不存在借贷扩大资本投入的情形。事实上,时至今日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现象在我国还比比皆是②。个人

---

① 这里的办企业是广义的,包括:农村家庭农场自主种植、城镇小商小贩、家庭作坊、私营企业以及各类所有制企业中的股权等。

② Song, Z., Storesletten K., and Zilibotti, F., “Growing Like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1): 196-233;李广子、刘力:《债务融资成本与民营信贷歧视》,《金融研究》2009 年第 12 期,第 137-150 页;于蔚、汪淼军、金祥荣:《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2012 年第 9 期,第 125-139 页。

在开办企业后,利润逐渐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与近年来居民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速较快、占比提升的事实相一致。

假设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减,$\alpha+\beta<1$。企业家首先需要选择雇佣劳动的最优数量,通过最大化一阶条件得:

$$L^{*}=\left[\alpha\left(\omega h_{t}\right)^{\beta}\right]^{\frac{1}{1-\alpha}}$$

代入 $H_3(n_t, h_t)$ 可得:

$$h''_{t+1}=\left(\alpha^{\frac{\alpha}{1-\alpha}}-\alpha^{\frac{1}{1-\alpha}}\right)\left(\omega h_{t}\right)^{\frac{\beta}{1-\alpha}}+n_{t}$$

令:$\left(\alpha^{\frac{\alpha}{1-\alpha}}-\alpha^{\frac{1}{1-\alpha}}\right)=\Delta_{\alpha}, h''_{t+1}=\Delta_{\alpha}\left(\omega h_{t}\right)^{\frac{\beta}{1-\alpha}}+n_{t}$

由于 $0<\alpha<1$,所以 $\Delta_{\alpha}>0$

代入个人最优化方程,解出:

$$h_{t+1}={}_{\alpha}\left(\omega h_{t}\right)^{\frac{\beta}{1-\alpha}}, n_{t}=0,\text{当 } h_{t}>\frac{1}{\omega}\left[\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alpha}\right]^{\frac{1-\alpha}{\beta}}\text{ 时;}$$

$$\begin{cases} h_{t+1}=\d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1+(1-\omega)^{\frac{1-\sigma}{\sigma}}}\left[1+{}_{\alpha}\left(\omega h_{t}\right)^{\frac{\beta}{1-\alpha}}\right] \\ n_{t}=\d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1+(1-\omega)^{\frac{1-\sigma}{\sigma}}}-\dfrac{{}_{\alpha}\left(\omega h_{t}\right)^{\frac{\beta}{1-\alpha}}}{1+(1-\omega)^{\frac{1-\sigma}{\sigma}}} \end{cases},\text{当 } h_{t}\leqslant\frac{1}{\omega}\left[\frac{(1-\omega)^{\frac{1-\sigma}{\sigma}}}{\alpha}\right]^{\frac{1-\alpha}{\beta}}\text{ 时}$$

这里的经济学解释是,当财富量比较低时,个人经商办企业采取自己做管理人的方式,投入一定的精力 n_t 进行经营管理,财富量越小,需要个人投入的经营管理精力越大。财富量较高时,个人投入到企业的精力会很少甚至趋于 0,更多选择职业经理人进行企业管理。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个人还可以在股份制下选择持有公司的股票,不直接参与公司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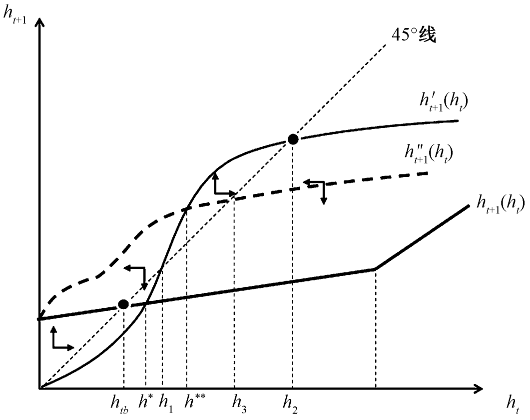

图 7　私人投资积累路径与收入差距的"倒 U"型变化

由于规模报酬递减,$\alpha+\beta<1$,则 $\frac{\beta}{1-\alpha}<1$,因此 $h''_{t+1}(h_t)$ 是凹函数,如图 7 所示,在允许个人经商办企业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情形下,至少经济不会收敛至低水平陷阱 h_{tb}。即使财富水平比较低的个人或家庭,也可以不选择简单劳动的积累方式,而选择自雇佣或创办小规模企业积累财富,我国改革开放不久的"万元户"现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命题 3:如果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能够允许不同财富水平的人可以通过经商办企业进行财富积累,那么将避免落入低水平陷阱。

(四)出现分配“倒 U 型”曲线变化的条件

沿着命题 2,如果人力资本生产率可以随时间变化而提高,即 $\theta_{t+1}=(1+\delta)\theta_t$,一定能在某一时刻使 $\theta_t>\theta^*$,出现图 5 而不是图 6 的情况。那么 $h_1<h_{tb}$ 会在某一时刻出现,所有人开始有机会理性地选择人力资本积累模式,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获得更高收入,这样避免出现了图 6 所示的贫富分化。

沿着命题 3,收入和财富差距缩小的出现需要满足一个必要条件,即 $h''_{t+1}(h_t)$ 与 $h'_{t+1}(h_t)$ 的交点 h^{**} 要在 45°线以上。否则低财富量的个人将收敛至 $h''_{t+1}(h_t)$ 与 45°线的交点,收入和财富分化仍然会出现,如图 8 所示。可以看出随着 Δ_α 的增加,$h''_{t+1}(h_t)$ 曲线不断上移,$h''_{t+1}(h_t)$ 与 $h'_{t+1}(h_t)$ 的交点 h^{**} 在 45°线以上的可能性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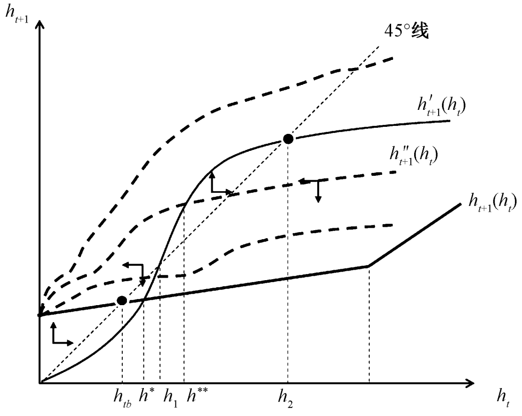

图 8　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减少与收入差距缩小

具体的,由于 Δ_α 关于 α 单调递减,而且:$\Delta_\alpha\in(0,\infty)$,

$$\lim_{\alpha\to1}{}_\alpha=0$$

$$\lim_{\alpha\to0}\Delta_\alpha=\lim_{\alpha\to0}(\alpha^{\frac{\alpha}{1-\alpha}}-\alpha^{\frac{1}{1-\alpha}})=\lim_{\alpha\to0}\alpha^{\frac{\alpha}{1-\alpha}}=e^{\lim\ln\alpha\frac{\alpha}{1-\alpha}\alpha\to0}$$

$$=e^{\lim\frac{\alpha\ln\alpha}{1-\alpha}\alpha\to0}=\lim_{\alpha\to0}e^{\frac{\ln\alpha+1}{-1}}=\lim_{\alpha\to0}\frac{1}{\alpha e}\to\infty$$

存在一个 α^*,使得当 $\alpha<\alpha^*$ 的时候,$h''_{t+1}(h_t)$ 向上移动到一定程度,可以保证交点 h^{**} 在 45°线以上。换句话说,个体或家庭投资生产经营所使用的生产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程度越低,就越有可能实现收入水平的跨越,从而在宏观上可能出现库兹涅茨曲线,同时社会财富收敛至更高水平。

命题 4:如果未来的制度变迁能够促进两个条件的出现,那么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将可能出现缩小,形成“倒 U 型”曲线,这两个条件分别是:其一,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不断提升;其二,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逐渐减少。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是否会呈现出库兹涅茨“倒 U 型”模式,在本模型中被刻画为在经济转轨下的两个重要的过程。其一是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替代过程。改革初期有能力选择人力资本积累路径的个体,通过从事复杂劳动先富起来,技术的不断进步,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藩篱的逐渐拆除,推动人力资本回报率上升,为更多家庭选择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提供可能,从而缩小收入和财富在家庭之间的差距。其二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过程。在市场化改革早期,一部分人离开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变为自雇佣劳动者或自主创业者先富了起来,随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激励更多个人和家庭进行投资性储蓄(经营办企业或持有企业股权,获得经营性和资本性收益),从而缩小收入和财富在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差距。

四、结　论

本文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的动态演变,探讨收入差距变化的库兹涅茨“倒 U 型”模式在我国出现的条件。首先梳理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变化的历史,强调这些变化的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背景,为建模分析提供历史依据。然后,本文构建个人(家庭)效用最大化模型,将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作为个人选择财富积累路径的外部制约,对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间分配随收入增长的历史演变和可能的发展趋势,给出一种理论解释。

在本模型中,经济转轨和制度变革赋予个人更多的财富选择路径,收入分配机制多元化和市场化,经济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制度变迁促进人力资本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方式非劳动密集化这两个条件出现时,个人有意愿和有能力选择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方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将成为可能。

基于理论模型分析,我们认为继续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个人的创造创新活力,允许个人或家庭按照自身的禀赋约束和发展目标选择财富积累方式,不仅可以带来整体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而且可以为进入收入差距缩小阶段创造条件。

A Study on the Dynamic Change of China's Income G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Ye Jingyi, Cheng 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vidual/family optimal decision-making model,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income gap,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possibility of continuously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according to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the path of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or the resident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from a single regulated wage income to a market-oriented human capital income and an enterprise investment income, created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s to choose their way of accumulating wealth on the basis of their own endowments, broken up the low-income state under equalitarianism, and promoted China to enter into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income growth with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dened. When the productivity of human capital is increasing, most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to choose the mode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mode is decreasing, and most people are willing to choose the mode of accumulation by enterprise investment, China will probably enter into the stage of income growth with income gap and wealth gap narrowed.

Key word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human capital, marketization

(责任编辑　李　铄)